

特約撰稿

# 必也正名乎：對中共 「14年抗戰」論述的若干辯證

An Argument over China's New Statement Changing Eight Years  
to Fourteen Years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蕭 譽 (Hsiao, Yu)

國立空中大學臺北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中國大陸已於今(2017)年9月變更教科書內容,全面凸顯「14年抗戰」的概念。新聞發布後,引發不少的議論。其中最主要的爭點有2:第一,「抗戰」爆發的起始點,可否從1931年的「瀋陽事變」開始算起?其次,中共改弦更張,以「14年抗戰」取代「8年抗戰」的概念,目的為何?本文的主要內容,即是針對上述爭點進行討論。透過歷史資料以及當代社會輿情的分析,本文認為:第一,「抗戰」乃「全面抗戰」之簡稱,其爆發點是「盧溝橋事變」,已是當今世人的普遍認知;中共混淆「抗戰」與「抗日活動」的意義,實有待商榷。其次,中共凸顯「14年抗戰」概念的最主要目的,則不外是維持其一貫的辯證思維,鞏固其為「抗戰中流砥柱」的論述。

關鍵詞：抗戰、抗日活動、8年抗戰、14年抗戰

## 壹、前言

按照中共當局早先的規劃，中國大陸各級學校果然在本學期（2017 年第一學期，9 月份開學）全面啟用新的《歷史》教材，並首次將「918 事變」列為抗日戰爭的起始點，開啟中共「14 年抗戰」論述的「新史觀」。此外，為了強化「新史觀」的教學，在由中共「國家教材委員會」統審、統編、統用的大陸中小學《語文》、《道德與法治》教材中，亦配合《歷史》教材全面更新，特意強化以「紅色史觀」為中心的「愛國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sup>1</sup>

於今（2017）年元月 3 日，大陸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即已發出「關於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14 年抗戰』概念的函」，通知全中國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廳（教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教育局等單位：「根據在教材中要落實『14 年抗戰概念』的精神，教育部要求對各級各類教材進行修改，在 2017 年春季教材中要求全面落實。」該函並指示上述單位：「請你們對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進行全面排查，凡有『8 年抗戰』字樣，改為『14 年抗戰』，並視情況修改與此相關的內容，確保樹立並突出 14 年抗戰概念。」（詳附圖 1）。

另據報載，中國大陸負責中小學教材編纂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相關負責人表示：「去（2016）年 11 月便已接獲官方通知，開始修正各類教材」，「包括教師學生用書的所有內容，課文課後作業的舉例和材料，都修改為『14 年抗戰』」；「涉及修訂的教材不只包含歷史、語文、思想政治等文科科目，連數學也有援引抗戰史之處，均需逐一修訂。」此外，在中小學教材之外，涉及抗戰內容的大專及職業教育用書，也在緊急修訂中。<sup>2</sup>

<sup>1</sup> 簡立欣，「918 事變 陸首度列抗戰起點」、「陸中小學三科 強化愛國教育」，中國時報，2017 年 9 月 17 日，第 A5 版。

<sup>2</sup> 請分別參閱李侑珊，「9 月起陸新教材稱 14 年抗戰」，旺報，2017 年 2 月 22 日，第 A5 版；大陸新聞中心，「大陸中小學教材全變 14 年抗戰」，聯合報，2017 年 2 月 22 日，第 A10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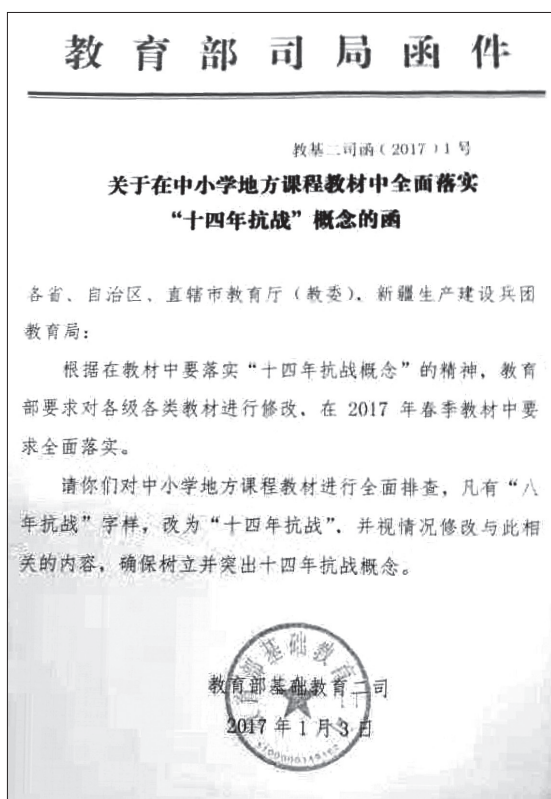


圖 1：大陸教育部《關於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14年抗戰」概念的函》

中共此舉，應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爭奪抗戰歷史話語權的延續，其作為有脈絡可循，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然歷史要靠史料說話，並非僅憑擅長辯證的中共一面之詞而可左右。其實，「8年抗戰」本是「8年全面抗戰」的簡稱，有其歷史論據。因此，中共要凸顯「14年抗戰」的概念，自有商榷的餘地。<sup>3</sup> 吾人對其後可能提出之相應話語的鋪陳，亦當持續保持關注。

<sup>3</sup> 例如大陸前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前會長張海鵬即認為：「14年抗戰概念並非史學界共識，使用這一概念將會遇到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在歷史上將難以做出交代。」而且「戰爭是國家行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國家與日本國家的戰爭行為，1937年7月7日以前，沒有發生這樣的國家行為。」又據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表示，中共關於「918是抗戰開始」的說法站不住腳，是搞混了「抗戰」與「抗日活動」兩者定義的差異。請參閱楊一帆，「中共改『8年抗戰為14年』史學界批駁」（2017年1月31日），2017年9月27日瀏覽，《大紀元電子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30/n8761308.htm>。

## 貳、中共的抗戰「話語」

中共搶奪對日抗戰話語權的企圖其來有自，手段亦隨著政治環境變化而有所更迭。早在抗戰時期，中共即不斷強調其領導抗戰之「中流砥柱」地位，例如 1941 年 5 月 25 日，毛澤東在對中共黨內的一篇指示中說：「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戰失敗，以利投降。」<sup>4</sup>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澤東在中共第 7 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復強調，共軍「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因為他們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sup>5</sup> 日本投降前夕，毛澤東發表的「摘桃論」，更是集中共抗日雄辯之大成，不但將抗戰勝利之功盡歸己有，甚且把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中正形容為「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傢伙」。<sup>6</sup>

此後，不論是國共內戰時期，兩岸對峙時期，乃至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為抗戰中流砥柱」之說，都未曾稍歇，例如 1985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報》在中共紀念「抗戰勝利 40 周年」的社論「歷史的昭示」中，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之觀點；<sup>7</sup> 1991 年 7 月 1 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70 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 8 年抗戰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sup>8</sup>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也分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50 周年」（1995 年 9 月 3 日）、「60 周年」（2005 年 9 月 3 日）、「69 周年」（2014 年 9 月 3 日）的大會上，都特別強調，中共

<sup>4</sup> 毛澤東，「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1941 年 5 月 25 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804-805。

<sup>5</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1039、1043。

<sup>6</sup>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124。

<sup>7</sup> 「過去 70 年，人民日報在抗戰紀念日說過些什麼」（2015 年 8 月 28 日），2017 年 4 月 20 日瀏覽，《壹讀網》，<https://read01.com/Pgzy3g.html>。

<sup>8</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7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1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20 日瀏覽，《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9/14/259476\\_605146859.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9/14/259476_605146859.shtml)。

是抗戰「中流砥柱」的觀點。<sup>9</sup>

一年之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93大閱兵」，2015年9月3日）<sup>10</sup>中的致詞，雖未再使用「中流砥柱」字眼，但在開篇即說：「70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完全勝利，和平的陽光再次普照大地。」<sup>11</sup> 習近平此次致詞的主軸是「和平」，另帶有濃厚的統戰意味，<sup>12</sup> 因此沒有使用「中流砥柱」這四個字，卻用了「人民」和「14年抗戰」等概念，巧妙的涵蓋了「中流砥柱」的意涵。

因為在中共的論述中，人民就是中共的代名詞，中共則是人民的化身。至於國民黨，則是只會打內戰、不會抗日的嚴重脫離群眾之「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是之故，國民政府的抗戰自然只能有8年，因為在1937年之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是不抵抗的，是喪權辱國的。自1931「瀋陽事變」開始的抗戰，當然就是由中共來領導的，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後，國民政府（蔣中正）才逐漸接受中共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決心接受中國共產黨和愛國人民的建議，實現團結抗日」。<sup>13</sup> 習近平在「93大閱兵」的講話中凸顯「14年抗

<sup>9</sup> 「江澤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5年9月3日），2017年4月20日瀏覽，《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6867/46869/3380530.html>；「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5年9月3日），2017年4月20日瀏覽，《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665666.html>；「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3日），2017年4月20日瀏覽，《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9/03/content\\_2744972.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09/03/content_2744972.htm)。

<sup>10</sup> 本次大會的主要內容就是閱兵儀式，因此又稱為「九三大閱兵」。此次閱兵是中共建政之後的第15次大型閱兵，也是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更是唯一一次不在「國慶」期間舉行的閱兵。

<sup>11</sup>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9月3日），2017年4月21日瀏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3/c\\_111645650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3/c_1116456504.htm)。

<sup>12</sup> 此次典禮，中共除了邀請各國元首、政要、大使等來賓之外，還邀請了包含抗戰老兵在內的臺灣各界人士約300人與會，曾引起臺灣輿論界的一番論戰。

<sup>13</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168。

戰」的概念，自然就包括了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的意涵在內。

### 參、中共凸顯「14 年抗戰」概念之目的

我們再看「93 大閱兵」的內容，其埋藏的細節就更清楚了。當天，在閱兵隊伍中，「東北抗聯英模部隊方隊」通過天安門前的閱兵臺時，司儀的介紹詞是：「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最早的抗日武裝，14 年周旋苦戰，堅苦卓絕，無數英雄故事，慷慨悲壯，感天動地。」<sup>14</sup> 其中的「東北」、「抗日」、「中國共產黨」、「最早」等提詞，都有將「14 年抗戰」與「中共領導抗戰」這兩個概念連結的意圖。

其實，早在 2015 年 7 月 30 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5 次集體學習時，就有過類似的論述，他說：「……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我們不僅要研究『77 事變』後全面抗戰 8 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918 事變』後 14 年抗戰的歷史，14 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要以事實批駁歪曲歷史、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錯誤言論。」<sup>15</sup> 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大陸教育部終於在今年初正式發文落實習近平凸顯「14 年抗戰」理念的指示。

準此，中共凸顯「14 年抗戰」的目的，最主要者應不外以下兩點：第一，就是繼續爭奪和強化對日抗戰歷史的話語權，並加強輿論宣傳工作，以利維持其政權取得和對內統治的「正當性」；另近年來，基於對臺統戰的需要，又有「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之說，以及「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用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的倡議，吾人對其後將會提出何種具體的作法，仍應持續關注。其次，則是對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團

<sup>14</sup> 閱兵實況，可參見中共八一製片廠攝製，「中國抗戰勝利 70 年勝利大閱兵」影片。

<sup>15</sup>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 7 月 30 日），2017 年 4 月 22 日瀏覽，〈國家行政學院網站〉，<http://www.nsa.gov.cn/web/a/yaowen/2015/0802/6182.html>。

體」的「日中戰爭」史觀的一種對抗，有「把日本打入國際正義黑暗面」的意圖，以遏制日本「修憲擴軍和出兵海外」的「東亞霸權」再起。

## 肆、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的理論基礎

中共如此強調其抗戰「中流砥柱」的地位，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共產黨「統一戰線」（「統戰」）的理論依據，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不同，述說的史觀就不同。毛澤東有言：「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主要法寶。<sup>16</sup>而領導權的問題，則是「統一戰線」中最為集中和重要的一個問題。<sup>17</sup>在中共的「統戰」觀念中，領導權問題是決定革命成敗的問題，由那一個階級掌握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也就決定了革命應走那一條道路。此即中共為何一再辯稱「聯俄容共」以及「對日抗戰」皆是由他們所領導的原因。中共的邏輯是：第一，中共促成了「統一戰線」；第二，此「統一戰線」達成了任務。

中共又認為，所謂「領導權」的問題，乃是「控制群眾」的問題。中共經常強調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革命的理論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能發揮無比的物質力量。」<sup>18</sup>所以，中共要對某一階層或是某一個地區進行「統戰」，一定先要做好宣傳鼓動的工作，改變人們的意志，打破傳統的觀念，從各方面下手，充分做好輿論的準備工作，使一般人對他所提的觀點深信不疑，在心理上無形中結成一條「統一戰線」。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民眾的教育水準也日漸提高，在中國大陸逐步走向世界的同時，中共「一言堂」的宣傳手

<sup>16</sup>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06。

<sup>17</sup>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重印版），頁207、216、220。

<sup>18</sup> 馬克思，「黑格爾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頁460。

法也遭到了許多的批評和挑戰。人們開始反思：「為什麼在一些大場面的抗日影片中，看到的都是國軍浴血奮戰的畫面，卻連一個共軍的影子都看不到呢？」「這些抗日神劇（大陸劇）也太神了吧，如果八路游擊隊那麼厲害，抗戰也不用打 8 年了吧！」「為什麼抗戰期間只有重慶大轟炸，卻沒有延安大轟炸？」「抗日都是八路軍在毛主席領導下完成的，期盼共產黨再度改寫近代史，搶攻話語權。」等等。

這類反思，網路上俯拾皆是！要如何處理這類問題？藉由「14 年抗戰」的論述，將東北的抗日活動包裹在內，或許可以為中共的抗戰論述找到一些「亮點」，然抗戰可以從 1931 年的「瀋陽事變」開始算起嗎？

## 伍、「抗戰」的定義

「抗戰」一詞，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定義為：（一）國家、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抵抗敵人侵略的戰爭；（二）在我國特指民國 26 年 7 月 7 日起，至 34 年 8 月 14 日止的抗日戰爭。由此定義可知：「抗戰」在我國而言，乃是指從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之後，到 1945 年 8 月 14 日抗日勝利為止的「8 年全面抗戰」，或稱為「8 年抗戰」。此說為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當今華人社會所普遍採用（中國大陸更改教科書後將另當別論）。

歐美主要國家則稱此次戰爭為“Second Sino-Japanese War”（「第二次中日戰爭」），戰爭年限亦是以「盧溝橋事變」為起始點的「8 年抗戰」為主流。<sup>19</sup> 日本官方（近衛文磨內閣）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稱該次衝突為「支那事變」；1941 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官方（東條英機內閣）將其納入「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更名為「日支戰爭」；但在日本戰敗後，日本政府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停止使用「支那」這個名詞，稱呼中國，遂改名為「日中戰爭」，為當前日本國內所通用，其指涉

<sup>19</sup> 研究中國問題之國際知名學者，如 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Ezra F. Vogel（傅高義）等人均持此種看法。



之年限亦為「8年」。<sup>20</sup>

至於從1931年「瀋陽事變」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6年間的中日關係，不論中外，少有學者會使用到「抗戰」這個名詞。「瀋陽事變」之後，在中國社會比較常見的是「國難」一詞，它不但屢屢出現於官方文書中，民間亦普遍採用，上海市民甚至製作了「國難」兩字大幅市招，以警醒國人注意，「國難」遂成為自「瀋陽事變」至「盧溝橋事變」這6年當中，政府與民間普遍用以概括此一時期國家處境之代名詞。因此，將此期間稱之為「國難期間」或「國難6年期間」，似乎更能貼近歷史的事實。<sup>21</sup>

另外，學者蔣永敬在「抗戰史論」一書中，有「局部抵抗」之說，<sup>22</sup>「局部抵抗」這個辭彙乃相對於「盧溝橋事變」後之「全面抗戰」而言，用語對仗，且有其概念之延續性，近年來受到媒體青睞，常被平面媒體和網路文章所採用。惟遺憾的是，就如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所言，許多人搞混了「抗戰」與「抗日活動」兩者定義的差異，將「局部抵抗」（「抗日活動」）說成了「局部抗戰」，這是不精準的。因為根據我教育部的定義，「抗戰」專指1937年到1945年中國對日的「全面戰爭」，是一場「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就中國而言，其成敗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對日本來說，這是現代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不但歷時最長、動員兵力最多、戰費空前龐大、戰爭的犧牲也非常之巨。<sup>23</sup>而在「1937年7月7日以前，沒有這樣的國家行為。」<sup>24</sup>由此觀之，依據我對「抗戰」的定義，中共採用「14年抗戰」的用語亦是不精確的，除非中共要對「抗

<sup>20</sup> 請參閱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陸海軍年表（東京：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1980年）。該書將1931年「瀋陽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段期間之日本軍事推移概況，列在年表前文。

<sup>21</sup> 請參閱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95；劉為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頁1。

<sup>22</sup>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48。

<sup>23</sup> 請參閱藤原彰（日）著，陳鵬仁譯，解讀中日全面戰爭（臺北：水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頁14-16。本書原文（日文）名稱為「日中全面戰爭」。

<sup>24</sup> 參閱楊一帆，「中共改『8年抗戰為14年』史學界批駁」。

戰」一辭另作解釋，那將另當別論。

## 陸、「抗戰」一辭大量使用於「盧溝橋事變」之後

中國全面「抗戰」開始於「盧溝橋事變」，「事變」之後，「抗戰」一辭開始大量使用於政府文書、文告，以及報章雜誌、民間評議之中。1937年7月11日，上海《大公報》的短評「我們只有一條路」，即曰：「盧溝橋事件，我方忍辱退讓，容納日方以保安隊接防而將29軍撤退的要求。詎意我撤而彼不撤，反而集結大軍，重來挑釁，以致復行衝突。昨（10）日下午起，我軍抗戰極為激烈。冀察當局以對方逼迫至此，決心抵抗；中央向抱不惹事不怕事的方針，人既著著進犯，當然也要努力自衛，因為我們現在除了抵抗，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sup>25</sup>

當時，中共對於「盧溝橋事變」的反應則甚為迅速，在「事變」的翌日（7月8日），中共中央即發出了兩則通電，一則是「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表示「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要求「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sup>26</sup>另一則通電是由毛澤東領銜之9名「紅軍將領」拍給蔣中正的電報，稱「日寇進攻盧溝橋，實現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聞訊之下震驚莫明（名）。平津為華北重地，萬不容再有喪失，敬懇嚴令29軍奮勇抵抗，並本3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sup>27</sup>

7月17日，蔣中正在江西廬山之「最後關頭」談話，則說「……前年5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全國國民要認清，所謂最

<sup>25</sup> 短評，「我們只有一條路」，上海大公報，1937年7月11日。

<sup>26</sup> 該通電全文可見於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343-344。

<sup>27</sup> 收錄於第五編：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頁269。9人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葉劍英。

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4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sup>28</sup> 蔣中正的「廬山談話」公布後，中國各界一致擁護，軍民同感振奮，「抗戰」到底的決心，乃深植人心。知名史學家張玉法更認為，「廬山談話」之後，「8年抗戰就此開始」。<sup>29</sup>

到了抗戰勝利之際，蔣中正在1945年8月15日對全國的廣播中，開篇不久就提到了「8年奮鬥的信念，……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我全國同胞自抗戰以來，8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強……現在我們抗戰勝利了，可是還不能算最後的勝利。……」<sup>30</sup> 蔣中正講話稿中闡釋的「8年抗戰」概念，實際上也就是當時國內外各界對中國「抗戰」歷程的普遍認知，連延安方面也不例外。

例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前夕發表的「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一文中，就說「8年抗戰，八路軍、新四軍受盡了蔣介石和日本人夾擊圍攻的苦楚，現在抗戰瞬將結束……」；<sup>31</sup> 又在8月16日為《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中提到：「蔣介石的內戰陰謀，當然不是從11日的命令開始的，這是他在抗戰8年中的一貫計畫。」<sup>32</sup> 吾人雖不認同毛澤東此類的言論，

<sup>28</sup> 請參閱何應欽，日軍侵華8年抗戰史，修訂一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7-9。另，蔣中正的「廬山談話」在當日並未公布，因中國政府正試圖經由英、美駐中、日兩國使節進行和平的斡旋。直到7月19日，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向何應欽提出「日本已有重大決意」的威脅，蔣中正才決定將「廬山談話」稿公開發表。請參閱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364-367。

<sup>29</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九版（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599。

<sup>30</sup> 全文可參閱何應欽，日軍侵華8年抗戰史，頁372-374。

<sup>31</sup> 毛澤東，「蔣介石在挑動內戰」（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38。

<sup>32</sup> 毛澤東，「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48。

但由毛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共產黨人認為的「抗戰」，也是「8年」。可見「8年抗戰」的概念才真正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境，真正符合當代人真實的生活感受。

## 柒、從「盧溝橋事變」激變成「全面抗戰」的周折

### 一、「盧溝橋事變」本為一地方性之軍事衝突

「盧溝橋事變」本為一地方性之軍事衝突，「事變」發生之初，整個局勢並未顯示必然會爆發中日全面戰爭。因此，蔣中正在 7 月 8 日上午，獲悉前夜盧溝橋守軍與華北日軍的衝突經過時，並不特別驚訝。他判斷此乃日方有意尋釁，因此在日記中記載：「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sup>33</sup> 蔣中正決定以積極的態度應付日軍的挑釁，目的在防止事態的擴大，並堅定華北駐軍（29 軍）的決心和士氣。他於 7 月 8 日採取了以下的行動：<sup>34</sup>

- （一）電令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並令宋「從速回駐保定指揮。」
- （二）電令南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準備增援華北。
- （三）電令時在重慶主持川康軍事整理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即行返回南京。
- （四）下令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率部北上；令劉峙先派一師至黃河以北，準備兩師待命出動。北上援軍，均歸宋哲元指揮。

日本方面，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初，也沒有對中國全面開戰的計畫。當時日本陸軍的假想敵是蘇俄，海軍的假想敵是美國，他們認為「國

<sup>33</sup> 國史館藏，「文物圖書一困勉記」，蔣中正總統檔案，卷 43，民國 26 年 7 月 8 日。

<sup>34</sup> 李雲漢，蘆溝橋事變，頁 328。

民政府無能，國家又未統一」，不可能引起全面性戰爭。<sup>35</sup> 不過，日本雖然避免擴大事態，而且也沒有打算在中國長期作戰，但日本欲控制華北的目的是很明顯的。7月9日，東京召開內閣會議，主張運用武力，一舉解決懸而未決之華北問題的陸軍大臣杉山元提議：派遣3個師團到華北。但因為9日凌晨，中日雙方華北駐軍代表已經達成停止衝突之協定，所以杉山元的提議沒有被接納。日本參謀本部當天的決定是：「不擴大事態」。<sup>36</sup>

7月10日，中日雙方華北駐軍代表繼續就撤退後的停戰協定內容商討。晚間，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今井武夫和我方代表張自忠、張允榮交涉。幾經談判，終於在11日達成共識，雙方並約定當天下午3時完成簽約。<sup>37</sup> 協定的內容為：（一）第29軍代表向日軍表示遺憾，並處分責任人，聲明保證今後防止類似事件發生。（二）因中國軍隊離豐臺駐屯地的日軍距離過近，容易引發事件，中國不再在盧溝橋城廓及龍王廟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三）鑑於本次事件中存在眾多所謂藍衣社、共產黨等其他抗日系各團體指導之痕跡，將來應對其進行澈底取締。<sup>38</sup> 至此，「盧溝橋事變」看起來應該可以和平解決了，但卻又傳來東京準備派兵的消息，情勢又轉趨緊張。

## 二、雙方政府調兵遣將，終於爆發大戰

東京決定派兵，是在11日召開的緊急會議（包含五相會議<sup>39</sup>和內閣會議）中決定的。經過裕仁天皇的批准，11日下午6時35分，東京發出「臨參命第56號」、「臨參命第57號」，派遣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和朝鮮軍（第20師團）至華北。<sup>40</sup> 緊急會議決定派兵的理由，

<sup>35</sup>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48。

<sup>36</sup>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頁252。

<sup>37</sup>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31。

<sup>38</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史料室藏，「北平陸軍機關業務日誌」。

<sup>39</sup> 五相為首相、外相、陸相、海相、藏相。

<sup>40</sup>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陸海軍年表，昭和十二（1937）年7月11日記事；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頁255。

一是因為「盧溝橋事變」激起中國全面的抗日情緒，華北地區尤為激烈，日本華北駐屯軍反映日僑將受到威脅；二是東京在 10 日得知蔣中正派國軍（中央軍）「延平漢線逐次調兵北上，同時逐漸準備對日戰爭」。這些最新的發展，使日本陸軍態度轉趨強硬，乃決定增加華北駐屯軍的兵力。中日兩國政府雖然都不希望擴大戰事，但對於對方的「挑釁」都採取了堅決應戰的姿態。<sup>41</sup>

從 11 日起，29 軍與日本華北駐屯軍間一方面進行和平談判，一方面又衝突不斷；中央政府也透過外交手段，企圖透過美、英大使從中斡旋，但都沒有成功。25 日夜間，雙方華北駐軍發生了「廊坊事件」，展開激戰；26 日下午，北平又發生「廣安門事件」，國軍斃敵甚多。當日晚，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要求 29 軍撤出平津，並限 28 日正午前答覆。不意日軍卻於 27 日即開始向通縣、團河一帶進攻，宋哲元遂亦通電各方，決心抗日守土，北平近郊戰爭乃全面展開。28 日晨，日軍在南苑發動猛攻，國軍不敵，副軍長佟麟閣、132 師師長趙登禹陣亡。激戰至 30 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29 軍退往保定。

另一方面，在「廣安門事件」發生後，東京方面乃同意華北駐屯軍攻擊平津地區國軍，同時動員日本本土的第 5、6、10 等 3 個師團，及第 18 飛行中隊增援華北日軍。<sup>42</sup> 國軍則在平津失陷後，決定「抗戰」到底。7 月 31 日，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曰：「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拼。」<sup>43</sup> 8 月 1 日，任命傅作義為第 7 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率部由綏遠、山西向察哈爾增援。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為副總司令，任察境之守

<sup>41</sup>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年），頁 219；加藤陽子著，徐曉純譯，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38。

<sup>42</sup>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頁 285。

<sup>43</sup> 全文請參閱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221。

備，<sup>44</sup>以抵抗日軍西侵，「蘆溝橋事變」終於發展成中國的「全面抗戰」。而中國最高決策當局對於「全面抗戰」之決定，乃是在8月7日於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會中並決定採「持久消耗」為基本戰略方針。<sup>45</sup>

## 捌、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奮鬥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國民政府及蔣中正的領導下，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歷經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38,931次。官兵傷亡：陸軍方面，陣亡131萬9,958人，失蹤13萬126人，負傷176萬1,335人，合計321萬1,419人；空軍方面，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方面，人員損失雖然不多，但全部艦艇，都在開戰初期的江防封鎖與歷次作戰中，損失殆盡。而人民直接間接之死傷者，則在2千萬人以上，流離失所者達一億人以上。至於財產損毀，資源損失，稅收及日偽所發鈔票之損失，實在難以估計。<sup>46</sup>由這些數字即可看出，國民政府及蔣中正領導抗戰，以及全國軍民犧牲奮鬥、保國衛民之不易。

而在巨大的消耗與損失之外，以下再列舉數項重大的歷史事蹟，來說明國民政府及蔣中正領導抗戰之成就：

（一）「蘆溝橋事變」後，蔣中正領導中國獨立抗日達4年5個月，時日軍動用50至75萬的兵力於中國戰場，幾占全部日軍之半，給日本以極大之消耗。及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盟軍並肩作戰，牽制日本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力量（一百萬以上的兵力和一百二十億美元左右的戰爭軍費），使日軍無法轉用於其他地區，否則亞洲其他戰場將更形惡化。<sup>47</sup>這就是中共每年都要紀念的中國對「反法西斯勝利」之貢獻，而這個貢獻正

<sup>44</sup> 何應欽，日軍侵華8年抗戰史，頁31。

<sup>45</sup>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頁383；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九版，頁596；李雲漢，蘆溝橋事變，頁406-412；蔣永敬，抗戰史論，頁271-276。

<sup>46</sup> 何應欽，日軍侵華8年抗戰史，頁403。

<sup>47</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666；張鳳翰，「論國軍與抗戰」，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190；Immanuel C. Y. Hs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709.

是在國民政府和蔣中正的領導下完成的。

(二) 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橫掃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相繼攻占了香港、新加坡、緬甸、菲律賓等地，盟軍黯然失色的表現與中國的長期抗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由於國軍在抗戰中英勇的表現，乃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在國民政府和蔣中正的要求下，英、美等西方列強於 1942 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抗戰的勝利，最終收回東北和臺澎的主權，不但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更使壓迫於中國的百年枷鎖根本解除。

(三) 由於國民政府及蔣中正領導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同盟國乃委任蔣中正為「中緬印戰區」（1942 年 1 月 5 日成立，亦稱「遠東戰區」、「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從而使中華民國成為遠東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強」之一。

(四) 1943 年 10 月 31 日，中、美、英、蘇 4 國代表在莫斯科簽訂《四國宣言》（又稱《普遍安全宣言》或《莫斯科宣言》，中國代表為駐俄大使傅秉常），聲明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戰爭，至其無條件投降為止，並同意儘速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中國的四強地位，遂在國際間獲得再一次的肯定。<sup>48</sup> 接著，中、美、英 3 國領袖於 11 月 22 日至 26 日間舉行「開羅會議」，並於 12 月 1 日發表《開羅宣言》，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 4 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sup>49</sup> 「開羅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一次以亞洲局勢為中心的國際高峰會議，也是中國元首第 1 次與西方強國以完全平等的身分討論世界事務，這位元首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抗戰」的領袖蔣中正，而不是毛澤東。

(五) 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 3 國領袖發表《波茨坦宣言》，對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波茨坦宣言》

<sup>48</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651-652；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增訂三版（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455。

<sup>49</sup> 「開羅宣言」中文文件請參見總統府機要檔案，「開羅會議卷」。



中簽名的中國領袖，亦是蔣中正，而非毛澤東。可笑的是，就在日本已經決定投降之時，中共竟以「延安總部」的命令，於8月10日夜至11日連發7道「命令」，要求「解放區軍隊」對日軍全線出擊，並稱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接受被共軍所包圍的日偽軍隊的投降。<sup>50</sup>殊不知，毛澤東所依據的《波茨坦宣言》，正是蔣中正代表中國政府簽字發布的；由此也可知毛澤東顛倒是非的辯證功力之不凡。

（六）戰後受降，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的對象是國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舉行受降儀式，由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委派何應欽接受日本投降；在盟軍受降方面，9月2日參加美艦密蘇里號受降儀式的中國代表徐永昌亦為蔣中正所委派，此皆足以說明誰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七）戰後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為《聯合國憲章》起草國之一。此《憲章》乃是經由我國立法院於1945年8月15日通過，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8月24日簽署後送存美國。依據《憲章》規定，中國為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中文亦被訂為聯合國使用之5種官方語言之一。這種國際地位的提升，也都是國民政府及蔣中正領導抗戰的成果。

不幸的是，由於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往臺灣，近年來，中共又迅速崛起，我政府的地位與貢獻乃逐漸為世人所淡忘。然史實具在，國人切不可漠視，而將「抗戰」歷史的話語權拱手讓與中共！誠如美國學者Lloyd E. Eastman（易勞逸）所說：<sup>51</sup>

為國民黨軍隊說句公道話，它在與一個在組織上、訓練上和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8年，與法國（它對德國

<sup>50</sup> 請參閱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頁464；毛澤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給蔣介石的兩個電報」（1945年8月13日及16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44。

<sup>51</sup> Lloyd E. Eastman 著，王建朗等3人合譯，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4-115。

的抵抗在僅僅 6 個星期的戰鬥後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歷史在 1945 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為一篇大無畏犧牲的英雄史詩。

## 玖、從「14 年」的觀點看中共的「抗戰」

### 一、「盧溝橋事變」前 6 年中共做了些什麼？

由以上的史實可知,國民政府和蔣中正為領導中國抗戰勝利之「中流砥柱」,應是當之無愧。但長期以來,中共以其機巧的辯證手法,鯨吞蠶食的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並反誣國民政府和蔣中正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者。然在中共以抗戰「中流砥柱」自詡之同時,卻又拿不出多少像樣的戰績來表彰自己,所以試圖通過修改教科書拉長抗戰時間,以凸顯從 1931 年「瀋陽事變」到 1937 年「盧溝橋事變」期間,中共「領導」「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日「貢獻」,以便強化其「主導抗戰」的論述。那麼,從「瀋陽事變」到「盧溝橋事變」這 6 年時期,中共究竟是如何抗日的呢？

(一) 首先,在 1931 年「瀋陽事變」後僅一個多月,中共即於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開分裂中國。然而,這個趁著國難當頭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公開提出的口號竟然是「武裝保衛蘇聯」,而非保衛中國。在 1932 年 1 月 28 日「上海事變」發生之後,中共發表的「鬥爭綱領」,對十九路軍之英勇抗日並不寄予同情,亦不將鬥爭目標集中於日本,反而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號召工人罷工,要求士兵殺掉長官,加入紅軍,「武裝

擁護蘇聯」。<sup>52</sup>

(二) 2月26日，中共又於「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得到勝利」一文中稱，「這次反日戰爭勝利的的原因，不是蔣光鼐、蔡廷鍇等一些國民黨軍閥的領導，而是革命士兵的英勇鬥爭與革命民眾的熱烈擁護。……因此要取得民族革命戰爭的澈底勝利，必須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這一領導，把領導權拿在民眾自己的手裡。」<sup>53</sup> 這篇文告中，中共所表達的不是要如何才能讓「反日戰爭」勝利，反而是要如何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三) 為「武裝保衛蘇聯」，中共於1932年4月15日對日「宣戰」。究其《抗戰宣言》內容，亦是針對如何打倒國民政府而發，幾乎不像是對日宣戰，而似對國民政府的宣戰書。<sup>54</sup> 且此《抗戰宣言》不過是紙上談兵，並無實際上的意義，因為中共侷促內地窮鄉僻壤之區，不可能與日軍接觸，所以也不可能有任何對日作戰的行為。反倒是利用國軍調動至淞滬地區抗日的機會，乘機圍攻贛州、上杭、武平、漳州各地，牽制國軍行動，客觀上成為日軍侵華的內應力量。

(四) 1933年春，國軍正在對「蘇區」進行第4次圍剿之際，日軍又發動「長城戰役」。江西共軍趁蔣中正北上保定指揮對日戰事之際，復分途出擊，攻城掠地，大肆發展，無異與日軍遙相呼應。<sup>55</sup>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的機會。然此時中共雖稱擁兵數十萬，但卻從未派過一兵一卒用具體的軍事行動去抗日，有的只是空洞無用的「宣言」、「口號」，以及蠱惑群眾的反政府言論而已。

<sup>52</sup> 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關於上海事件的鬥爭綱領」（1932年2月2日）。請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第四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年），頁324-325；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16-17。

<sup>53</sup> 中共中央文件，「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得到勝利」（1932年2月26日）。請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325-326。

<sup>54</sup> 中共中央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佈對日抗戰宣言」（1932年4月15日）。請參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24-25。

<sup>55</sup> 李雲漢，蘆溝橋事變，頁48-49。

(五) 至於中共想要強調的「東北抗聯」在東北的抗日事蹟，無非也是其「敵後游擊戰」論述的延伸，和「8 年抗戰」期間對其「解放區抗戰」功績的表述，並無什麼區別。而且，在「東北抗日義勇軍」中，並非全部都是由中共所領導的，例如其中最著名的馬占山將軍，就是國民黨員。這種情況，就和「抗戰」時期的敵後戰場（中共稱「解放區」）一樣，也不是所有的敵後抗日武裝都是由中共領導的，其中，除了有國軍的游擊隊外，還有許多自發的抗日武裝力量，只是中共利用襲擊、吞併、土改、統戰諸手段，乃逐漸取得敵後「根據地」之優勢而已。因之，中共在東北的抗日歷史爾後將會如何論述，值得吾人多加關注。

(六) 要之，從「瀋陽事變」到「盧溝橋事變」這 6 年間，中共對抗日的反應大致可以分為 3 個階段：<sup>56</sup> 第一階段，係自「瀋陽事變」至 1935 年 8 月的「八一宣言」，其綱領乃是執行共產國際的策略，空言抗日，實則擴大叛亂與「武裝保衛蘇聯」；第二階段，自「八一宣言」至「十二月決議」，<sup>57</sup> 是轉變時期，其目標為「由絕路轉向生路」；第三階段，自「十二月決議」到 1936 年的「西安事變」，暫時擺脫了國際主義外衣，以偽裝的民族主義者，向全國各階層展開以「抗日救國」為綱領的統戰活動，終於解除了全部覆亡的危機，取得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統一戰線」也就成為毛澤東引以為傲的「法寶」。

## 二、「盧溝橋事變」後 8 年中共是如何「抗戰」的？

(一)「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中共於 7 月 15 日向國民政府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簡稱《國共合作宣言》），寄望利用「抗戰」的時機圖謀再起。在幾經談判之後，9 月 22

<sup>56</sup>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 97。

<sup>57</sup> 中共中央竄抵陝北之後，與共產國際重新取得聯繫。依據張浩（林毓英）帶來的共產國際指示，於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瓦窯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是中共中央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 1 個正式決議，並把他們的「蘇維埃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史稱「十二月決議」。請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第四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 年），頁 108-113；決議文（摘錄）請參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 49-53。

日，國民政府將原文略作修改，以《共赴國難宣言》的名義向世人發表，文中中共向國人提出「四項保證」，<sup>58</sup>至此，中共的「蘇維埃運動」和「蘇區」乃正式成為歷史名詞。但接踵而來的，卻是換湯不換藥的「邊區」政府的成立。中共雖然把「陝甘寧蘇區」改為國民政府特區，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但其政策和中央卻迥然不同，除名義變更外，仍然保持「蘇區」時代的一切。因此，中共之《共赴國難宣言》完全是一紙空言，不但八路軍不服從軍事委員會之指揮，「邊區政府」亦不接受政府之命令，較之其一意要打倒的封建軍閥，割據之害更為強烈。

(二) 1937年9月，八路軍奉命開赴晉北作戰前，毛澤東對其幹部指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sup>59</sup>這項指示的內容，便是中共在「抗戰」中最好的寫照。所以，在「抗戰」期間，中共並無什麼特殊的戰績可言，但其發展卻是異常的驚人。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它已從改編成八路軍時的四萬餘人，發展成具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的龐大組織，<sup>60</sup>和規模不小的「解放區」了。（如表1）這才是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最大成就。

<sup>58</sup> 〈共赴國難宣言〉（1937年9月22日），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雙方公布之文字略有出入。4項保證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sup>59</sup>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第四版，頁222。

<sup>60</sup> 毛澤東，「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30。

表 1：抗戰期間中共「解放區」發展概要

地區	根據地名稱	人口	野戰軍人數	地方武力人數
陝北	陝甘寧邊區	135 萬	不下三萬人	二十二點四萬餘人
華北地區	晉察冀邊區	2500-3000 萬	三萬五千人左右	六十五萬餘人
	晉冀魯豫邊區	2500 萬	五萬人以上	四十萬餘人
	晉綏邊區	322 萬	二萬六千人左右	五萬五千餘人
	山東區	2400 萬	二十七萬人左右	民兵七十一萬餘人 自衛團 150 萬人
華中地區	蘇北區	370 萬	二萬三千人左右	八萬五千餘人
	蘇中區	760 萬	一萬九千人左右	十三萬餘人
	蘇南區	190 萬	六千人左右	二萬五千餘人
	淮北（皖北）區	302 萬	一萬八千人左右	——
	淮南（皖東）區	208 萬	二萬一千人左右	——
	皖中區	166 萬	五千人左右 <sup>61</sup>	二萬五千餘人
	浙東區	——	五千人左右	一萬餘人
	鄂豫皖區（大別山區、中原區）	920 萬	二萬二千人左右	——
	湘鄂贛區	——	——	——
華南地區	東江區	一百餘萬	三千人左右	——
	瓊崖區	一百五十餘萬	五千人左右	——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 331-381；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頁 16-2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九版，頁 622-623；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第二版，頁 420-429；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頁 2、18、526；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現代卷上冊，頁 271。

（三）至於在「8 年抗戰」之中，中共能搬出檯面作為其戰績宣揚的主要有 3：一為「平型關大捷」；二為「百團大戰」；三為「牽制侵略日軍百分之六十四，牽制偽軍百分之九十五。」關於平型關和百團大戰二役的

<sup>61</sup> 此區到抗戰末期只剩極少數的中共正規部隊（約 500 人）。這種現象可能是基於以下兩種原因：一、此區國軍派有強大的部隊；二、此區對日本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請參見 John K. Fairbank, Albert Feuerwerker 編，劉敬坤等合譯，《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 1912 - 1949, Part 2），頁 668。

是非功過，已有甚多論著評論，惟此二役的規模與國軍對抗日軍的22場會戰相較，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何「中流砥柱」之有？另關於牽制敵偽軍問題，更是集中共辯證術之大成。此乃日軍在中國廣大戰場上兵力不敷使用，只能占領大中城鎮和重要交通線，中共在鄉間又遊而不擊，避免與日軍作戰；偽軍則苟求自全，對於以「抗戰」自命之共軍亦無作戰興趣，因而共軍與偽軍大體上也相安無事，共軍對之何得稱為「牽制」？另據王健民教授所述：抗戰末期，當中共不斷宣傳共軍牽制敵軍百分之六十四、偽軍百分之九十五時，外國駐重慶記者一面電訊紛飛，傳播於世界各地，一面求證於參謀總長何應欽，何應欽答以：「共軍僅牽制敵軍百分之0.3」。因當時侵華日軍達百萬之眾，僅以三千人防守陝北黃河東岸，以監視陝北共軍，如是而已。<sup>62</sup>

## 拾、結語

今年恰逢「盧溝橋事變」80周年，80年前的7月7日，因為「盧溝橋事變」而導致「抗戰」全面爆發，是為「8年抗戰」。「8年抗戰」本是世人對中國抗日年限的普遍認知，不論華人世界或是西方人士多抱持此種看法，殆無疑義。惟中共於今年9月新學期，將學校教科書中「8年抗戰」字樣全部改為「14年抗戰」，以凸顯「14年抗戰」的概念。中共的目的不外有二：其一，就是繼續爭奪和強化對日「抗戰」歷史的話語權；其次，則是對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團體的「日中戰爭」史觀的一種對抗。預判其接續的作法，可能是以加強「盧溝橋事變」前6年中共「領導抗戰」（尤其是東北）的論述為之。吾人在關注中共修改教科書之同時，亦應同時注意其相應的論述，以免將抗戰話語權拱手讓予對方。

<sup>62</sup>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189。